

“老漂族”的新朋友圈：随迁老人的城市 社会网络构建模式研究

■ 罗恩立 梅士伟 吴可锐 吴一凡 金天

摘要：我国人口迁徙和人口老龄化催生了“老漂族”这一特殊流动群体。在扎根理论基础上，利用 NVivo 12 Plus 软件，基于 28 份随迁老人深度访谈资料进行质性分析。从不同地区随迁老人的城市社会网络现状出发，以网络构成类型为支撑，比较分析随迁老人城市社会网络的构建模式和路径。研究发现，随迁老人社会网络构建呈现出“芦苇型”“苔藓型”“劳燕型”“灵鸟型”等模式，构建路径包括基于关系秩序回归的微环境影响情感型网络、依托社区邻里的社交型网络、场域包容作用的政策保障工具型网络。被动回家或主动留下的选择背后均折射出随迁老人重“圈子”、想融入又缺乏网络构建支持机制及经济约束。据此提出相关建议，包括覆盖“老漂族”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基本公共设施适老化改造、社区积极开展“老漂族”适应性项目等。

关键词：随迁老人；社会网络；社会融入；网络构建模式；构建路径

【中图分类号】C913.6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23.01.011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引言

随着中国城市化加速、老龄化社会来临，“老漂族”已成为常态化的社会人口现象。参考学术界的已有成果^[1]，本研究的“老漂族”是指那些为满足支持儿女、照顾孙辈或个人养老的需要，离开户籍登记地来到子女定居城市生活的老年群体。原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6》显示，我国流动老人将近 1800 万，约占全国总流动人口 2.47 亿的 7.2%。“老漂族”人口数量增长，但迁入地社会网络构建渠道不够通畅，使得我国流动人口服务和城市社会治理面临挑战。在国家层面，养老服务的“放管服”改革要求政府投入精准化；在社会层面，这一群体的诉求日益受到关注；在家庭层面，其城市生存状态对子女

就业质量可能产生影响；在个人层面，随迁老人面临着原有社会网络断裂、新社会关系尚未建立的困境，这关乎他们在城市的生活质量。

本文选取上海、苏州等城市进行资料搜集，通过掌握这些城市“老漂族”社会网络构建现状，聚焦随迁老人需求和融入程度，比较研究其城市社会网络构建的不同模式及路径，以期促进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社区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助力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

一、文献述评

（一）社会网络相关研究

社会网络理论研究既定的社会行动者（包括社会中的个体、群体和组织）所形成的一系列关系和纽带，将社会网络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解释社会行为。社会网络既会连接起没有纽带关系的行动者，也会将行动者划分到不同的关系网络。

格兰诺维特（Mark S. Granovetter）认为个人社会网络可以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网络，弱关系更能跨越其社会界限去获得信息和其他资源，因而有更好的信息传播效果。在社会网络中，要获得新信息、新观念等，弱关系往往比强关系更能发挥较大的作用^[2]。林南认为社会资源嵌入个人的社会网络中并通过个人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关系所获得^[3]。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 Coleman）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认为它存在于社会网络之中，其规模和异质性影响社会资本回报^[4]。

国内学者发现，强关系在经济转型期依然发挥重要作用。行动越能嵌入与目的相关的网络，行动者则越能借助社会网络实现目标^[5-6]。费孝通基于以家庭为核心的传统人际关系网络，描述了由个体作为中心逐渐向外推移表现亲疏的社会关系网络格局——“差序格局”^[7]。黄光国提出情感型、混合型、工具型三种遵循需求、人情、公平法则的“人情面子”网络模式^[8]。

基于此，本研究关注“老漂族”以随迁家庭为基础的关系网络发展状况，期待理解这一群体在随迁城市构建社会网络的情况。

（二）“老漂族”内部网络发展研究

社会交往关系方面，“老漂族”适应城市的过程也是其适应新的人际交往的过程。“年纪大”且“另起炉灶”是影响其能否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适应城市生活的两大因素^[9]。随迁老人来到陌生城市，逐步脱离原有社交网络，新社区交往多流于表面，相互了解较少^[10]。相应地，人际关系疏离且信任度较低，生活方式隔离度高^[11]。

代际情感支持方面，流动性社交圈层结构往往以“己”为中心^[12]，根据关系远近来构建，一般与家庭成员的沟通最为频繁。老人的生活重心主要是子女、孙辈和少数熟悉的人^[13]。“老漂族”随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子女工作、生活和以后发展。城市生活的快节奏与工作压力影响子女与随迁老人的交往互动，容易使他们产生新的情感隔阂^[14]。他们将大

多数时间用于照顾孩子或孙辈,减弱了构建人际关系网络的主动性^[15]。刘钰曦等人认为,配偶、子女未能给予老年人以关爱和经济支持也使得社会关系网络构建面临困境^[16]。

网络构建意愿方面,社会排斥影响“老漂族”对社区的心理认同和归属感。这一群体内心渴望融入本地老人圈子,以实现社会关系的重塑^[17],但面临诸多阻碍,包括语言不通、本地居民的偏见、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不兼容”等^[18]。与本地居民经济社会处境的差异容易使“老漂族”形成心理隔阂,导致构建新社会网络的意愿相对弱化^[19-20]。

(三)“老漂族”社会支持网络发展研究

“老漂族”社会网络构建需要适应其心理和行动的社区互动空间。由于年龄较大,生活习惯固化,随迁老人一般保持着中国传统的“故土”情结和传统乡村社会记忆^[21]。社区文化娱乐设施和场所较为紧张,“老漂族”与本地老人缺乏互动的空间,社会网络构建的空间基础较为薄弱^[22]。社区层面活动的组织和安排有助于改变老人闲暇空间狭窄、封闭、单一的现状,提高社区参与积极性,拓展活动空间^[23]。

社会环境因素层面,地域差别影响“老漂族”的归属感。城乡二元结构下形成的群体间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差异等在社区环境中表现明显^[24],形成其城市社会适应的又一障碍。如语言方面,他们来到城市后在社会适应过程中急需重建新的社交圈,而语言不通障碍带来极大不便^[25]。当外来人员难以与当地人实现语言互通,将更难适应新的社会,缺乏心理归属感^[26]。

制度因素层面,政策影响体现在养老保障机制的完善上。社保体系对社会网络的构建及运行稳定尤为重要,建立跨区域的社会医疗保障网络体系,为“老漂族”提供更加个性化、便利化的生活服务,对其融入城市具有促进作用^[27]。

“老漂族”社会融入和网络构建仍存在难度,主要源于政策、环境和个体因素的共同作用。关于“老漂族”社会网络的界定参考道格拉斯·梅西(Douglas Massey)等^[28]的相关定义,即指迁移群体通过亲属、朋友或同乡等关系与迁出地居民(包括从未发生迁移的居民和曾经迁移而后返乡的居民)和迁入地居民(包括迁入的居民和当地原有居民)所建立的人际关系总和。本研究采用质性分析方法,关注“老漂族”城市社会生活中的互动关系,以应用为导向,探讨其社会网络构建模式,以期对流动人口治理和城市治理现代化有所启示。

二、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工具

本文在资料分析处理上使用 NVivo 12 Plus 软件,同时运用扎根理论对资料进行有效编码,避免烦琐的资料处理,并通过分析访谈资料归纳出“老漂族”社会网络构建的不同模式和路径。

(二)研究过程

在调研地点的选择上,通过对 2018 年中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进行初步分析,考虑样

表1 受访者基本情况表

编号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随迁时间	迁出地
A1	女	58	小学	6年	农村
A2	男	67	初中	13年	农村
A3	男	62	小学	2年	城市
A4	男	60	半文盲	20年	农村
A5	女	64	小学	3年	城市
A6	女	67	文盲	2年	农村
A7	男	70	初中	20年	城市
A8	男	64	小学	16年	农村
A9	男	60	小学	5年	农村
A10	男	63	高中	3年	城市
A11	女	61	小学	15年	农村
A12	女	64	小学	2年	农村
A13	男	53	初中	1年	农村
A14	女	72	文盲	1年	农村
A15	女	68	初中	20年	城市
A16	男	64	小学	11年	农村
A17	女	60	小学	3年	农村
A18	男	65	初中	18年	城市
A19	男	69	初中	10年	城市
A20	男	53	小学	30年	城市
A21	女	60	文盲	1年	农村
A22	男	66	大学	7年	城市
A23	女	61	文盲	3年	农村
A24	男	58	小学	12年	农村
A25	女	64	小学	19年	城市
A26	女	71	文盲	5年	农村
A27	男	59	小学	14年	农村
A28	女	70	文盲	17年	农村

本代表性和样本获取便捷性,选出上海、苏州等外来人口占比较高的典型城市。通过查找调研地政府网站数据以及走访当地出租车司机等方式,确定城市中随迁人口较多的区域。考虑到老年人的行为习惯,以便利抽样的形式着重关注广场、公园等公共活动区域,积极发现潜在访谈对象。

研究对象界定为年龄60周岁以上,离开户籍登记地来到子女居住的城市生活的老年群体。研究人员对随迁老人开展了平均时长60分钟以上的访谈,并且对部分老人进行二次访谈。同时,对于收集到的访谈资料进行差异性分析,删除冗余且不完善的样本,从中筛选出28份较为典型的样本作为下一步编码分析的资料基础(表1)。

(三)样本基本信息

本次研究采取半结构化访谈,通过匿名访谈并录音保护受访者隐私。表2展示了参

表2 初始访谈样本特征(N=28)

特征	N(%)
年龄	
50~60岁	9(32.1)
61~70岁	17(60.7)
70岁以上	2(7.1)
性别	
男	15(53.6)
女	13(46.4)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20(71.4)
初中及以上	8(28.6)
随迁时间	
1~10年	15(53.6)
11~20年	12(42.9)
21年及以上	1(3.6)
迁出地	
城市	10(35.7)
农村	18(64.3)

与深度访谈的受访者基本特征:在28名访谈对象中,大多数人所在年龄区间为61~70岁;受访者中男女性别比例趋于平衡,具有代表性;受教育程度方面,小学及以下的受访者占到71.4%;随迁时间上,大部分受访者都在20年以下;迁出地上,由农村迁入城市的比例更大,占到总数的64.3%。

(四)资料编码与分析

借助NVivo 12 Plus软件对收集到的访谈资料进行分析,将访谈信息导入软件中,按照开放式编码、关联式编码、选择式编码的顺序进行多级编码,具体情况见表3。

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对访谈资料的词句和片段进行概念化、抽象化的标示,提炼出隐藏于资料中的相关概念。具体操作方式为:初步分析访谈资料,对自然语言进行精简,并对同一概念进行语义上的对比与选择。基于以上操作,共提取出32个初始概念。

2. 关联式编码

关联式编码是在提取初始概念的基础上,寻找各概念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已提取概念的进一步分析,判断其是否能进行归纳整合并形成更高层次的范畴。在对以上32个初始概念进行反复辨析,并判断其合并关系之后,本研究将其归纳为13个范畴。

3. 选择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要求系统处理范畴之间的关系,形成基于范畴关系的扎根理论。本研究在关联式编码所确定的13个范畴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关联,最终选择出抽象程度最高的4个核心范畴:个体网络、亲缘网络、社区网络以及制度网络。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老漂族”社会网络困境

1. 既有生活轨迹的脱离

“老漂族”融入城市是以身份认同为最高目标的递进过程。从编码表可以看出,心理距离问题谈及较多,对于“老漂族”社会网络构建影响较大。由于乡土情结,大多数老人始

表3 编码表

主范畴	副范畴	初始概念	材料来源	参考点
C1 个体网络	B1 心理距离	A1 与他人的交往意愿	22	42
		A2 与他人的交流频率	24	41
		A3 交朋友的心态	15	23
	B2 生活满意度	A4 对迁入地的满意程度	26	43
		A5 对精神生活的满意度	25	28
		A6 对物质生活的满意度	22	27
C2 亲缘网络	B3 关系评价	A7 与子女的关系	20	23
		A8 同住状况	18	21
		A9 地理距离	15	19
	B4 情感交流	A10 联系频率	26	39
		A11 看望频率	22	40
	B5 物质交换	A12 对子女经济支出	8	13
		A13 子女经济资助	9	13
	B6 照料供应	A14 生活照料来源	18	30
		A15 子女照料频率	21	33
C3 社区网络	B7 文化适应	A16 认同意愿	14	26
		A17 语言适应	27	28
		A18 实际行动	24	26
	B8 社区参与	A19 社区活动类型	26	34
		A20 社区活动参与类型	24	27
		A21 社区活动参与频率	28	38
	B9 社区特征	A22 活动场地	12	19
		A23 活动设施	9	9
	B10 社区关系	A24 社区交往人员类型	15	20
A25 社区交往频率		17	28	
C4 制度网络	B11 医疗保险	A26 报销问题	21	31
		A27 制度差异	16	23
	B12 福利保障	A28 信息壁垒	14	17
		A29 制度匮乏	13	13
	B13 经济适应	A30 社会保障情况	13	19
		A31 与流入地人群收入差距	11	15
		A32 住房情况	15	21

终认为自己是外地人。由于“外乡人”的身份认知,其社会网络构建更多地选择与相同籍贯或有随迁经历的人交流,表现出明显的偏向性。

“因为我没有这边的户口,而且也听不懂他们说话,从这个方面来看肯定还是个外地人,但我儿子又都在这边,以后肯定也是在这边时间更长,感觉又像是本地人。”(A19)

大部分“老漂族”随迁是出于经济压力或隔代照料任务,日常生活主要围绕工作和家庭照料。他们难以将精力放在个体网络构建活动上,心理上也排斥和外界产生过多交往,呈现得过且过的心理。

“生活还是想自己过,但是得过来带孩子,老的有能力肯定还是要帮小的,现在这种生活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就这样过下去吧。”(A26)

2. 话语权失落:家庭网络内部易产生冲突

在家庭网络中,代际观念冲突使得家庭话语权更多往年轻一代倾斜。在NVivo编码中可以发现,相较于物质交换,情感交流对于“老漂族”显得更加重要。他们在适应新生活的过程中,也面临矛盾的认知经验。与此同时,代际价值观的差异将较为明显。

“跟子女的交流频率一般,闲下来也讲得少,跟他们观念差得大。我也是和儿子住在一起的,但是住在一起聊不到一块儿,老是发生矛盾。”(A14)

对于承担工作和隔代照料这一类型的“老漂族”来说,在家庭内的照料压力更大,情感需求更加明显。当家庭内部情感支持不足时,他们会表现出一定的沮丧情绪。

“我们来这边就是一定要打工,这个打工跟年轻人上班不一样,我们干得多就多拿点钱,不干就没钱。也不是每天都有活干,就是要找活干,不然没钱。”(A27)

3. 圈子隔阂:生活世界的差异

“老漂族”构建社区交往网络主要通过社区活动参与或人情交往。现实中,社区活动作用有限,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隔阂。部分“老漂族”通过与其他随迁老人、摊贩交往来建立以人情联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

访谈中发现:一是社区日常活动很少特别关注到这一特殊群体,这限制了社区发挥其促进社会交往的作用;二是智能设备看似拓宽了他们的社交空间,但数字鸿沟会使老年群体更易产生被排斥感。

“没文化不识字,智能手机、上网之类的都不太用,农村人啥也不会。看人家都用微信,咱们又不会用。”(A26)

4. 身在异乡为异客:被“遗忘”的居民

“老漂族”存在身份认同模糊问题,同时也面临社会保障资源缺失的困境。另外,这一群体信息相对闭塞,对政策解读能力有限,强化了“老漂族”与本地老人的沟通障碍,这可能还会延伸至其子女乃至孙辈。

“我孙子在这边上不了学,好像是因为户口问题。这边不给上学,所以等他长大了还得带他回老家上学,具体到时候咋办看他父母,不行俺们就回家给他带孩子还方便点。”(A3)

“老漂族”较为关心制度转移接续的话题,医疗保障诉求强烈,但流动老人保障制度转移接续以及异地就医兼容难度较大。相应地,这一群体对迁入地生活境况的期望降低,也影响其构建社会网络的积极性。

(二)“老漂族”社会网络构建

1. 网络构建模式

针对“老漂族”的社会适应空间变动,有学者提出物质空间、社会空间、精神空间三个层次,展现物质和精神在其生活空间中的意义^[29]。针对中国特色的人际关系网络,费孝通

表4 “老漂族”访谈所涉高频词汇 NVivo 分析表

	单词	计数	加权百分比(%)
芦苇型	打工	80	1.21
	孩子	67	1.01
	老板	60	0.91
	同事	53	0.8
	朋友	52	0.79
	老伴	50	0.76
苔藓型	小孩	72	1.29
	依靠	66	1.18
	小区	59	1.06
	老家	56	1
	手机	54	0.97
	事情	50	0.9
劳燕型	回家	47	1.39
	来回	45	1.33
	孩子	44	1.3
	要求	36	1.07
	老家	28	0.83
	本地	27	0.8
灵鸟型	子女	46	1.27
	朋友	39	1.07
	丰富	38	1.05
	不错	34	0.94
	公园	31	0.85
	适应	30	0.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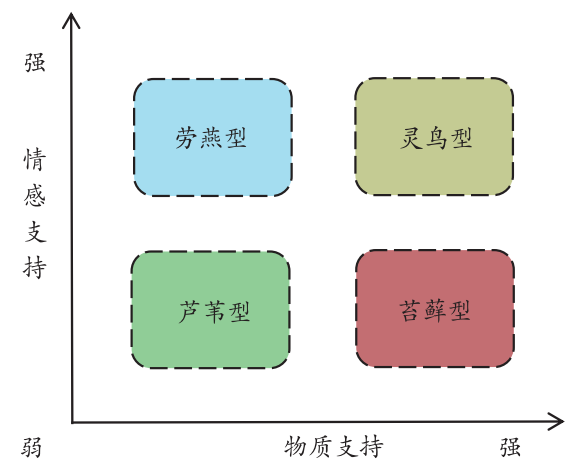


图1 社会网络类型划分

先生提出“差序格局”这一概念,将其定义为在血缘关系基础上建立的亲疏远近关系结构。结合这一群体在社会网络中获得的情感、物质支持强度及流动原因,基于访谈资料的质性分析,我们对这一群体社会网络构建模式进行概括,由此划分和命名为芦苇型、苔藓型、劳燕型以及灵鸟型社会网络四种类型(图1)。

图1中,横坐标为“老漂族”获得的物质支持强度,越往右支持越强;纵坐标为这一群体获得的情感支持强度,

越往上支持越强。横纵坐标大致体现了其在迁入地的生活状态。具体而言,芦苇型社会

网络的老人大多是通过获得更多收入而为家庭提供物质帮助的进城务工型老人。他们在经济上对子女的依赖程度低,获得子女的情感支持较少。苔藓型社会网络的老人与子女共同流动,肩负较重隔代照料任务和主要家务。此类老人大多出身农村,养老金较少,经济基础差。劳燕型社会网络的老人往往有多个子女,多个孙辈的照料需要使得他们不得来回流动。灵鸟型社会网络的老人通常经济条件较好,自给自足的同时还能关照到子女的家庭。这类老人生活自由,受到子女约束少。

本研究通过 NVivo 12 Plus 软件对访谈资料进行词频分析(表4)。

(1) 芦苇型社会网络

芦苇型社会网络下的“老漂族”身上体现了留恋乡土与不得不背井离乡之间的矛盾。他们的社会网络像芦苇一样稳定性不强,容易因自身工作变动而变化。老人虽然可能与亲人两地分居,但家庭仍然是芦苇型社会网络的核心。长期共同工作使得其与同事联系紧密,工作圈是老人在迁入地接触最为频繁的圈层。

“在这边虽然一个人,但是在一起的还有很多同事,大家都是外地来的,平常不忙的时候一起喝喝酒吃个饭也挺好。”(A9)

可见,芦苇型社会网络呈现出“家庭—工作圈—社区—政策保障”逐次递减的差序性。

(2) 苔藓型社会网络

与苔藓需依附外物一样,此类老人在经济和情感上都对子女有很高依赖性。子女在城市中工作较为忙碌,照料和陪伴老人的时间少,“老漂族”获得子女物质支持较多。

“我们农村来的,也没多少收入,跟着孩子他们收入也一般。我们作为老的能帮他们一点是一点,自己也没有养老保险,养儿防老,和他们在一起也有个保障。”(A12)

由此,苔藓型社会网络表现为“家庭—社区—政策保障”的人际关系逐次递减的差序性。

(3) 劳燕型社会网络

劳燕型社会网络类型的“老漂族”流动较为频繁,在每个迁入地生活时间不长,社交圈子经常变动。他们由于需要帮助多个子女,而在不同家庭间流动甚至与配偶分离。类似鸟类季节性迁徙的频繁流动为老人带来了心理压力,疲惫感较强。

“孩子多了也遭罪,现在在这大城市上班忙得很,孩子顾不过来。俺一儿一女,还不在于一个地方,他们小孩都小,等着我带,给儿带完给女儿带,不然有意见没办法。”(A3)

可见,劳燕型社会网络的差序性特征并不明显,更多是从家庭出发来构建社会网络。

(4) 灵鸟型社会网络

此类“老漂族”与子女关系密切,并依据自身兴趣构建社会网络。在一定程度上,老人帮助子女在城市落脚扎根,子女在情感上更频繁关照老人,形成良性的家庭互动。这类老人在社会网络中的交往对象往往不局限于亲属,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生活圈,是“老漂族”中发展人际关系最为积极的群体。老年大学、公共场所活动受到这一群体青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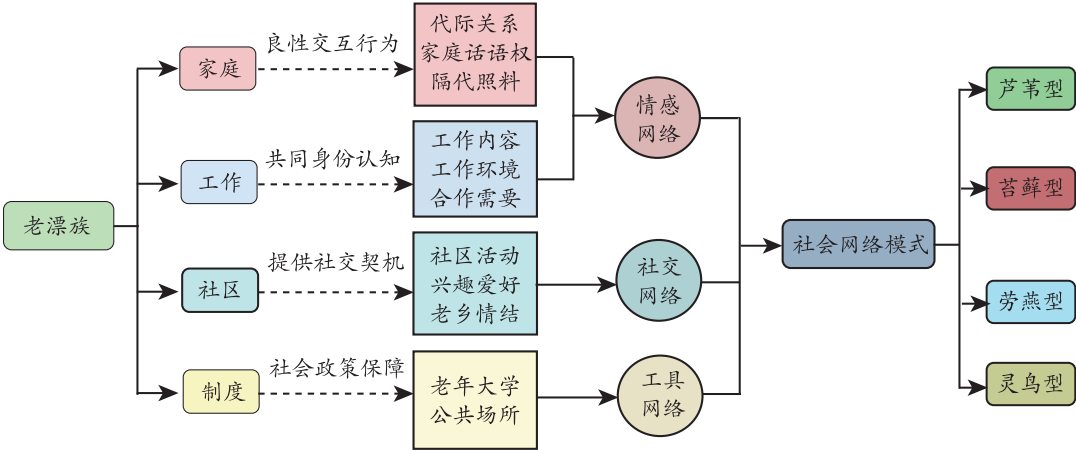


图2 构建路径图

“我们白天会去这边的老年大学，那边的课程很多，大家刚认识的跳跳舞、下下棋都可以。这边公园广场也多，每天晚上都有跳舞等活动，外地人本地人都很多，反正就在一起玩。”(A20)

这一类型的社会网络呈现“家庭—政策保障—社区”的差序性。

2.“老漂族”社会网络构建路径分析

基于社会网络类型分析，本文以社会网络子网络类型为支撑点探寻“老漂族”社会网络构建路径过程。

(1)关系秩序回归：微环境影响情感型网络

家庭微环境是“老漂族”社会网络构建的重要依托。我们发现，子女的物质或情感支持能够提升老人在随迁地的幸福感和社会网络构建意愿。家庭成员与“老漂族”在家庭中的互动情况可以作为这一群体是否从家庭微环境中构建出较强社会网络的判别标准。

工作微环境社会网络的构建路径主要体现在务工型“老漂族”身上。基于工作内容和环境，他们将工作圈子从“陌生人圈子”向“熟人圈子”转换，拓展强关系网络。“老漂族”与同为外地务工人员的同事能更快建立起社会网络节点关系，为彼此提供情感支持。“老漂族”在工作中与周围人交往频次增加，社会网络节点拓宽，网络构建意识也得到提高。

“平时聊天也就是和我的同事，一起干活的人聊聊天，没事的时候，就跟我几个同事一起钓鱼。”(A2)

(2)远亲不如近邻：依托社区构建社交型网络

“老漂族”在社区中的社会网络构建分为浅层交往和深层交往两种。浅层交往对象包括社区工作人员、周围摊贩，交往状况与其对环境熟悉程度有关；深层交往指以兴趣爱好和社区活动为媒介，与志趣相投的社区居民开展交往。子女大多早出晚归忙于工作，“老漂族”通过日常生活交流和人情互助等方式强化社会网络节点。

“我们这群人在一起就会聊聊天、早上晨练有时候都会遇到他们，在一起打打太极、练

练功,我们也会在一起交流。”(A16)

(3)场域包容作用:政策保障维持工具型网络

参与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的活动是“老漂族”构建社会网络的重要途径。政府通过对公共空间的管理和秩序维护,有助于形成这一群体稳定的社会网络。政策保障能够为老人社会网络构建提供可靠渠道,减少其构建社会网络的不确定性。

参与老年大学是“老漂族”构建社会网络的有效途径。老年大学一般是通过民政部拨款招募师资,设置多样化课程,招生不设门槛,可以作为老人融入陌生环境的渠道,满足其交往意愿。共同身份有助于减少这一群体对自身“外地人”的标签化认知,提高社会网络构建积极性。

“老年大学是很好的,我和老伴来这边排了几个月队了都没报上名,这个参加的人太多,不是很好进去,进去之后都是一帮老年人在一起,也很开心的。”(A20)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为促进“老漂族”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和福祉增进,以形成有利于其迁入城市的本地社会网络,本研究重点探讨了“老漂族”社会网络的构建模式和构建途径。

研究发现,由于随迁原因差异,“老漂族”社会网络构建呈现出“芦苇型”“苔藓型”“劳燕型”和“灵鸟型”等模式特征,反映了其在迁入地的适应状态。在社会网络构建路径上,存在基于关系秩序回归的微环境影响情感型网络、依托社区邻里的社交型网络、场域包容作用的政策保障工具型网络。可见,和谐的家庭关系、多样化的社区活动参与、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等等都有可能成为“老漂族”拓展社会网络的契机。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通过社会组织介入,促进“老漂族”熟悉新环境

面对完全陌生的环境,一些“老漂族”迁移到新城市后会选择减少与外界交流,这阻碍了社会网络的构建。基于此,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介入这一群体,帮助其打开社交之门。比如设立社区融入项目,关注出行、购物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活动,使其能够更加沉稳地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放下心中对未知事物的成见,积极主动地构建新的社会网络。

(二)以社区学校(老年大学)为载体,设置多样化的社会网络构建课程

一方面,依托社区资源,提高老年大学办学承载能力。针对老年大学“很抢手”的困境,可通过挖掘和整合社区资源来改善,如吸引沿街商铺(如花店)等进课堂;借助社区活动室等公共空间拓宽授课场地;通过鼓励社会捐赠冠名等途径扩大经费来源。另一方面,在老年大学里设置促进社会交往的课程,帮助“老漂族”在班集体内与同学建立起较为稳定的社会网络,使其逐步放下心理负担,自如地构筑新社会网络。

(三)以家庭关系建设为依托,增强“老漂族”社会网络拓展的情感支持

家庭是重要的社会网络构建节点,“老漂族”对外社会网络建构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从家庭获得的情感支持和对外交流鼓励。调查发现,如果子女鼓励父母进行社交,老人也会表现出更高的积极性。融洽的家庭氛围可以给老人提供更好的情感支持,继而促进其对外构建新社会网络。

(四)完善随迁老人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网络构建期望值

首先,要加快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使“老漂族”能在迁入地安家落户,与本地居民享受同等的福利待遇。其次,提供多样化的社区参与活动,为“老漂族”的社会网络构建提供更多的资源和平台。此外,对于“老漂族”比较关心的一些福利政策(如养老金领付和老年优待),可以考虑增加覆盖面和简化办理流程。

参考文献:

- [1] 江立华、王寓凡:《空间变动与“老漂族”的社会适应》[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5期,第68-72页。
- [2] Mark S. Granovetter,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6):1360-1380.
- [3] 林南:《社会资源和关系的力量:职业地位获得中的结构性因素》[J],《国外社会学》1999年第4期。
- [4] 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M],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81页。
- [5] 边燕杰、张文宏:《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J],《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第77-89、206页。
- [6] Yanjie Bian, “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Connection, Bridge, and Job Search in China”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7(3):366-385.
- [7] 费孝通:《乡土中国》[M],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页。
- [8] 黄光国:《人情与面子》[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5年第3期,第55-62页。
- [9] 孙金明:《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问题的社会工作介入——基于“积极老龄化”视角》[J],《人民论坛》2015年第36期,第152-154页。
- [10] 张新文、杜春林、赵婕:《城市社区中随迁老人的融入问题研究——基于社会记忆与社区融入的二维分析框架》[J],《青海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第88-95页。
- [11] 孙丽、包先康:《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状况及社会工作介入研究——以“城市性”兴起为背景》[J],《广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第67-72页。
- [12] 傅正科、吴飞:《超越陌生:社区整合与公共家园的媒介建构》[J],《新闻界》2015年第17期,第29-38页。
- [13] 刘庆:《“老漂族”的城市社会适应问题研究——社会工作介入的策略》[J],《西北人口》2012年第4期,第23-26、31页。
- [14] 高振峰、魏婉怡、朱邱晗:《体育参与与农村随迁老人的城市融入——一项基于B市L社区的探索性研究》[J],《体育与科学》2019年第6期,第64-70页。
- [15] 陈盛淦、吴宏洛:《二孩政策背景下随迁老人城市居留意愿研究——基于责任伦理视角》[J],《东南学

术》2016年第3期,第62-67页。

[16] 刘钰曦、冯晓晴、万崇华、谭健烽、禹玉兰:《广东省东莞市随迁老人主观幸福感分析》[J],《中国健康教育》2020年第3期,第230-233页。

[17] 李珊:《影响移居老年人社会适应因素的研究》[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1年第12期,第2301-2303页。

[18] 宋晓星、辛自强:《随迁老人和本地老人的群际接触与其幸福感的关系》[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9年第5期,第615-623页。

[19] 徐至寒、金太军、徐枫:《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路径的障碍及其消解——基于资本要素禀赋的视角》[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年第1期,第57-66页。

[20] 李旻、迟美灵、谭晓婷:《农村随迁老人福利的测度及差异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20年第7期,第117-130页。

[21] 李理、蒋宏宇:《社会融入视角下随迁老人体育参与及其保障研究》[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118-123页。

[22] 段良霞、景晓芬:《西安市随迁老人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8年第6期,第1487-1490页。

[23] 史国君:《城市“老漂族”社会融入的困境及路径选择——基于江苏N市的调查与分析》[J],《江苏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第83-87页。

[24] 时立荣:《透过社区看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J],《新视野》2005年第4期,第64-65页。

[25] 焦璨、尹菲、沈小芳:《“老漂族”领悟社会支持对孤独感的影响——基于心理弹性、认知功能的中介作用》[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80-87页。

[26] 陶巍巍、王跃、张玉林、闫倩倩、张波、魏杰、李紫微:《随迁老人自我接纳能力及孤独感对其社会适应水平的影响》[J],《中国护理管理》2018年第8期,第1051-1056页。

[27] 刘庆、陈世海:《随迁老人精神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深圳市的调查》[J],《中州学刊》2015年第11期,第73-77页。

[28] Douglas Massey, Joaquin Arango, Graeme Hugo and Ali Kouaouci,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Review and Appraisal” [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93(3): 431-466.

[29] 黄晨熹:《大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特征与社区化管理》[J],《中国软科学》1999年第7期,第51-55页。

作者简介:罗恩立,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梅士伟、吴可锐、吴一凡、金天,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本科生。

责任编辑:卢小文